



# “增长兼顾公平”时代的终结？ 东亚社会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

王 丰

## 概 述

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世界大部分地区经济社会不平等现象激增。二战后不久，东亚国家经历了一段经济增长、社会再分配的“增长兼顾公平”时期，随后一段新的“增长与不公平共生”时期到来。这不仅造成社会分裂，也威胁民主体制，严重制约经济增长。展望未来50年，东亚这个二十一世纪主要的经济增长区域是否会出现更多经济社会不平等现象？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同时收入不平等现象也快速加剧。中国的经验证明国家既可以成为不平等现象的制造者，也可以成为平等的推行者。经济发展的成果公平分配需要借助市场以外的力量，需要国家政策来应对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并创造具有长期积极意义的机会。

过去50年来，亚洲——尤其是东亚——的经济发展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短短50年，东亚变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1955年，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台湾的人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上（26.66%），但GDP总和仅占世界9%<sup>1</sup>。50年后，东亚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降至23.24%，但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却几乎增长到原来的三倍，达到25%。现在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均位于东亚。随着中国领跑该地区继续扩张中的经济实力，加上日本、韩国和台湾，东亚的经济崛起仍在继续。自1955年以来的50年中，东亚地区由世界上最贫穷的区域之一一举变为最富裕的区域。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60、70年代乃至80年代中期前，日本、韩国与台湾这三个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有一个特定的标签，即“增长兼顾公平”。它们的经济快速增长不仅体现在GDP上，也使大多数

<sup>1</sup> 该数据和以下关于经济表现的数据根据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 – 2008 AD (2009) 计算得出。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和收入按购买力平价 (PPP) 计算。详情请见 [http://www.ggd.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 – file\\_02 – 2010.xls](http://www.ggd.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 – file_02 – 2010.xls), 2011年5月25日获取。

人受益，其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高。日本、韩国、台湾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对所有人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与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帮助这些经济体避免了社会动乱，促成或是加强了民主政府。

到这50年经济增长结束之际（2005年），东亚国家“增长兼顾公平”模型的未来已经受到了严重质疑。该区域经济增长中期出现的有限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正不断恶化。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是地区经济增长引擎，也导致了地区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加剧。

“增长兼顾公平”模型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导致了当前不平等水平的转向与恶化？重回增长兼顾公平的前景如何？

## 增长兼顾公平

过去50年中，东亚地区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成功。1960年至1987年，日本的人均收入翻了两番，从4000美元增长到16000美元（该数据及以下收入数据均以美元为单位）。在此之后韩国和台湾取得了类似的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1969年至1989年，韩国的人均收入翻了两番，从2000美元增长至8000美元；此后到2003年的15年间，这个数据又翻了一番，达到16000美元。台湾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以相近的速度增长，在1999年达到16000美元，比1977年的4000美元翻了两番。中国是这些经济体中最后一个开始快速发展的，其人均收入水平也在20年左右翻了两番，由1980年的1000美元增长至2002年的4000美元。自21世纪初起，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步伐仍在加快。

该地区较早取得经济成功的日本、韩国与台湾的增长兼顾公平模式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可以找到数据支持（见数据1）。在这三个地方，以基尼系数，即不平等现象在人均净收入中所占比例来计算，经济不平等程度在GDP增长初期出现了下降。基尼不平等系数最小为0，最大为1，前者表示完全平等（每个人收入完全相等），后者表示完全不平等（所有收入集中在一人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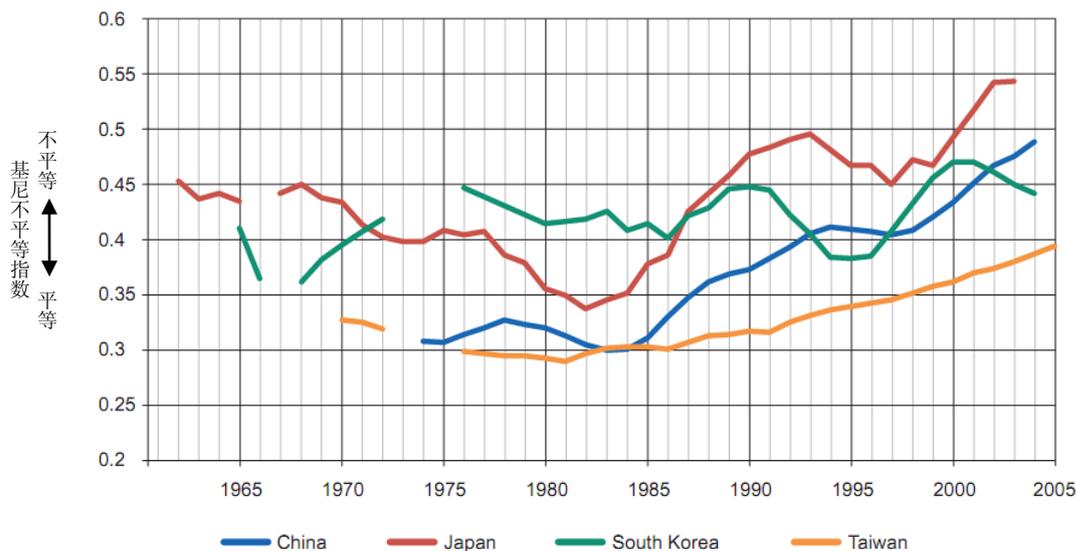


图 1 1960 年至 2005 年东亚收入不平等趋势（人均净收入）

注：线条中断处表示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此处所用不平等数据基于 Frederick Solt, “The 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Version 3 (July 11, 2010), [Http://hdl.handle.net/1902/1/11992](http://hdl.handle.net/1902/1/11992)。对该数据来源的描述请见 Frederick Solt, “The 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90, no.2 (2009):231-242

早期不平等现象减少的趋势在日本和台湾最为明显。日本的数据更为完整。在日本，不平等现象大幅减少，基尼系数由20世纪60年代的0.45降至70年代末的0.40，1982年降至0.34。<sup>2</sup>在台湾，早年只有零星的数据可供参考，基尼系数由1961年的0.50降至60年代末的0.35，70年代末进一步降至0.30以下。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基尼系数之一。

韩国同期基尼系数有所波动，没有清晰的趋势可循。韩国与日本和台湾的区别在于其不平等现象并未减少，但仍然符合公平增长模型，因为其不平等现象并未随着GDP增长而增加。这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模式形成了对比，例如墨西哥、巴西等地经济增长伴随着不平等现象增加。

中国则自成一派。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收入不平等水平非常低。这有一部分通过制造其它形式的不平等实现，如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分割。

大约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收入快速增长和区域不平等现象持续下滑两大趋势共同存在，形成了公平增长的态势。东亚不仅成为经济增长楷模，也成为公平收入分配的模板。东亚的例子也与认为持续经济增长初期必将伴随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普遍看法产生矛盾。<sup>3</sup>

## 什么造就了增长兼顾公平模型？

东亚经济增长及收入不平等现象减少背后的原因过去没有得到充分解释。有很多复杂原因，但其中有几个值得注意。

东亚地区有着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重视共同物质利益。个人需求与利益服从于集体（家庭或国家），集体主义的社会文化传统立足于确保集体内所有成员的最基本福祉。当东亚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时，注重农业社会中家庭成员共享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被某种程度上带到了新的城市工业社会。在变革的半个世纪的前期，日本、韩国与台湾的公司通常在工资以外，为员工提供托儿、住宿、终身就业保障、医疗和用餐补贴。此外，为了反映家庭主义观念，工资与住房通常考虑到员工的年龄和家庭组成。在中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工作单位为所有员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福利和服务。

东亚经济转型也遵循了出口型增长模型。出口导向型生产是东亚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造成了对大量

---

<sup>2</sup>此处所用不平等数据基于 Frederick Solt, “The 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Version 3 (July 11, 2010), [Http://hdl.handle.net/1902/1/11992](http://hdl.handle.net/1902/1/11992)。对该数据来源的描述请见 Frederick Solt, “The 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90, no.2 (2009):231-242

<sup>3</sup>这种想法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Simon Kuznets 的研究而闻名，20世纪50年代中期，Kuznets 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倒U型关系假设。他推测收入不平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将先增加，再逐渐平稳。

工厂员工的持续需求。年轻人从农村迁徙到城市，迅速找到更高薪水的工作。大规模制造业使大多数受雇佣者获得更公平的工资。在城市工作的移民通常会把收入的一部分寄回老家，支撑从事农业的父母，支付弟弟妹妹的上学费用，这有助于降低城乡收入不平等水平。

东亚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基本上缺乏民主政治体系，通过家长制统治满足人们对于公平增长的需求则成了获取政治合法性的方法。每个社会基本上都控制着出口型经济的发展，进而创造就业和收入。该地区的社会都显著改善了公共教育，提高了公共保健水平。在这50年中，该地区的年轻人与世界同步，享受了最大幅度的预期寿命增长和教育水平提高。这在很大的范围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上述因素虽然也存在于其它时代或社会，但从未像在东亚地区这样所有因素共同作用，带来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

## 大逆转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亚洲公平增长时代告终。收入不平等持续加剧的现象开始出现在该地区几乎所有地方。如前页数据1所示，台湾、日本与韩国的情况逆转分别始于1982年、1983年和1987年（韩国不平等现象增加数年后，停止了一段时间，随后反弹）。到21世纪初，也就是公平增长模式出现50年后，这些社会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几乎均超过了50年前。

东亚不平等现象加剧最重要的例子是中国。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最惊人，同时收入不平等加剧也最迅速的国家。代表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基尼系数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0.30增至世纪之交的0.45。在过去30年，这使得中国成为所有大国中收入不平等加剧最快的国家，也是目前世界上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这种剧烈变化原因何在？全球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时期亦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时期。此一时期扩张的动力在于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理念和跨国企业不断增强的实力对国家和地方政权的挑战和损害。20世纪80年代末全球范围内大部分共产主义国家的崩溃进一步增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感。

过去几十年来，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了后工业时代。通常代表更公平收入分配的大规模制造业被不断扩张的服务业所取代。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薪酬差异更大也更为不平等。服务业有一些领域（如金融和信息技术）聚集着少数收入极高的个人，而其它领域（如临时工）则充斥着无数低收入的个人。

从此几乎世界上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收入不平等加速增长的趋势。比如在美国，60%家庭的实际收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保持基本不变。而到90年代末，美国收入最高5%人口的实际收入增长了将近50%。<sup>4</sup>几乎其它所有主要工业化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瑞典、英国和前西德）在70年代后也出现了收入不平等加剧现象。一份针对73国的综合报告显示，从1950年至1995年，除了9个国家以外的所

---

<sup>4</sup> Charles Tilly, *Durable Inequali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231

有国家中，48个不平等现象加剧，16个保持不变。这73个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80%，GDP占世界总GDP的92%。<sup>5</sup>

在全球不平等上升的背景下，曾经在早期的东亚发展中造就了增长兼顾公平模式的地方力量也遭到了削弱，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现象。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造成了该地区人口结构的快速转变。家庭和亲戚网络这种传递和培养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主体开始老化、变小、变弱。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随着电视、互联网这样的现代媒体被引入和传播到该地区，极大地挑战和削弱了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

在日本、韩国与台湾这样的东亚社会，经济增速开始放缓，服务业开始扩张，机会越来越少，竞争则愈发激烈。中国旨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sup>6</sup>的既定经济发展国策超额达成了目标。随着时间推移，一开始较小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来越大，演变成新的持久的收入不平等社会分层。

## 重回公平增长？

东亚出现的由“增长兼顾公平”到“增长与不公平共生”的大逆转成为了该地区乃至全世界越来越紧迫的社会和政治热点。随着20世纪初“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世界看起来准备质疑不受监管的市场经济理念和不受约束的贪婪和不平等现象。

我们能从东亚早期的“增长兼顾公平”中学到哪些经验教训呢？是否有可能重回“增长兼顾公平”时代，使经济增长造福于大多数人？

第一个教训就是市场不能独自扮演再分配仲裁者的角色。经济增长从来不是也不能成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万能灵药。在有限时间内，经济增长的确曾经在上述东亚社会中大范围减少贫困。但减少贫困和减少不平等不一定是同一件事。在包括东亚在内的很多社会，减贫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如影随形。东亚早期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使大多数人受益。除了脱贫以外，这也包括拥有更多机会实现持续大规模经济和社会流动性。但是缺少了公平收入分配，近期的市场经济扩张则导致了更加不平等、分裂的社会。

但是东亚的经验也表明，政府收入再分配并非改善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国家与政府一直被视为确保市场竞争和进行收入再分配以限制市场经济负面社会效应的关键机构。在东亚现代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每个政府都在制定经济战略、吸引资金、监管劳动者和开放出口市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地区政府在不同程度上也通过制定实施社会福利项目进行了收入再分配。

在该地区的各个社会中，通过收入再分配降低不平等水平的成绩最多只能算好坏参半。在有些社会，如日本和台湾，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项目帮助改善不平等现象，却未能阻止其加剧。从再分配调整后的人均净收入来看，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的趋势均有所减弱。20世纪80年代后人均净收入不平等现象虽然有所加剧，但并未像家庭总收入分配那样出现180度大转弯。即使在国家再分配制度得以推行的社会，其效力还是随着近年不平等加剧而减弱。最显著的改善效应仅发生在早期经济增长时期。

国家再分配在20世纪60、70年代乃至80年中期前也许确实有利于“增长兼顾公平”模型，但在最近几

---

<sup>5</sup> Giovanni Andrea Corina, eds., *Inequality, Growth, and Poverty in an Era of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sup>6</sup> 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

十年却在对抗不平等加剧趋势方面乏善可陈。

照理，中国付出了巨大努力来通过再分配减少不平等现象。但中国的事实表明，单靠再分配无法有效防止收入不平等加剧。两个重要的国家制定与支持的制度原因造成了中国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与社会格局的割裂。个人仍然因居住地和就业而被分成各个层次。城乡之间、受雇于不同行业的城镇职工之间以及不同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基本上造成了现有收入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继续加剧的趋势。<sup>7</sup>虽然像其它东亚经济体一样，中国近年来的经济繁荣将数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制造业，但是像户口这样的国家体制壁垒仍然分隔着城镇居民和农村移民。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近年来国家对经济资源越发加强的控制，主要通过加快税收增幅和资源开发来实现。1998年至2008年，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中国的GDP增长了3.34倍；同期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仅增长2.91倍，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仅增长2.2倍。同时，政府收入增长6.21倍，税收增长5.85倍，远高于经济增速（见图2）。10年中，政府收入占GDP比重从1998年的11.7%增至2008年的20.4%，几乎翻番。

不打破国家支持的垄断，就几乎不可能减少中国收入不平等现象。同样地，财政资源在国家手中高度集中也应该打破。政府可将开发资源获益用于公共项目，以期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但这样的项目更有可能使那些最靠近国家权力中心的人受益。中国的再分配政策缺乏平等性。在更具优势的城镇地区，再分配更为慷慨、增长较快；而在传统的弱势农村地区，再分配力度非常有限，甚至有倒退现象。<sup>8</sup>针对该地区其它社会的研究显示，再分配性质的税收政策基本上收效甚微。<sup>9</sup>政府自身无法自动成为好心的收入再分配者。

---

<sup>7</sup> 例如，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一直高于 2。这一差距并未由于过去 30 年的大规模减贫而缩小。从 1995 年国企工人大量下岗前一年到有最新的官方数据的最后一年 2009 年，城镇国有单位的员工收入增长了 5 倍。这与集体所有制单位的 4 倍增长和其他单位（包括私营和合资企业）的 3 倍增长形成了对比。数据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 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表 4-12 计算得出。

<sup>8</sup> Qin Gao, “Redistributive Nature of the Chinese Social Benefits System: Progressive or Regressive,” *The China Quarterly* 201 (March 2010): 1-19

<sup>9</sup>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Pacific, United Nations, *Growth with Equity: Policy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Selected Asian Countri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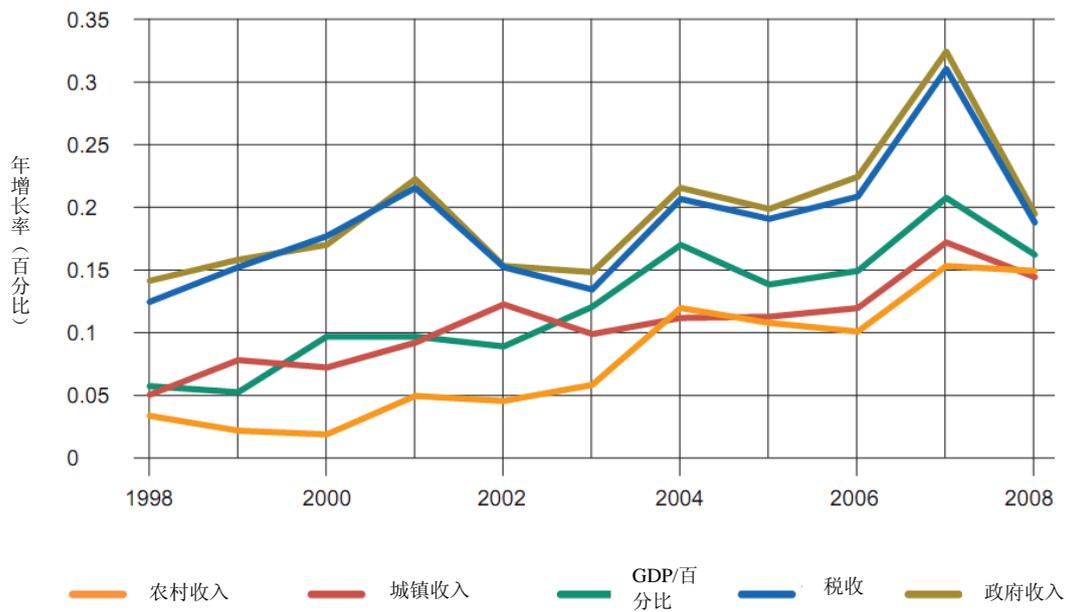


图 2 1998 年至 2008 年中国年经济指数变化率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编《2009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中国近期的趋势与东亚其它社会早期的经验共同表明，单靠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无法达成收入分配公平的经济增长。增长兼顾公平并非只出现在政治和社会真空。市场与社会分离以及市场带来增长，社会对利益进行公平再分配的理念站不住脚。政府没有充分地对利益进行再分配，进而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

相反地，保障经济增长并公平分配增长成果需要除市场或国家再分配以外的其它力量。“增长兼顾公平”要求制度重构、集体认同、决心实干。它要求国家政策应对不平等加剧的起因，而非仅仅试图处理结果。这样的政策包括劳动力市场监管，禁止因民族、性别和其它社会背景造成的歧视。必须出台政策确保穷人和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医疗保健服务，这将为个人带来好处和权利，类似政策也展现出了良好的长期效果。

解决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成为东亚地区几乎每个社会的主要任务。在未来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增长兼顾公平将继续成为该地区追求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的达成绝非易事。与世界上其它地区一样，东亚地区的不平等现象已从单纯的劳动力市场收入问题演变为财富聚积和相应的生活机遇问题，也为持续不平等的打下了基础。

日益加深的经济不平等不仅造成社会分裂，更威胁民主制度，严重制约经济增长。大量人口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源，无法成为有效的生产者，因此也缺乏经济资源，无法成为有效的消费者。增长兼顾公平不仅是促进增长、创造财富的人们所应得的，更是有利于社会长期利益的关键因素。相当程度的收入平等对于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不可或缺。

随着东亚成为领跑全球的经济强势区域，地区收入不平等也达到了历史峰值。这些社会面临着理解不平等加剧的全球、地区和社会根源的挑战，开始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改革，应对收入不平等加剧问题。东亚必须立刻建立包容的经济增长模式，惠及最广泛的社会方方面面。东亚曾经由于取得公平增长而成为世界羡慕的对象。如今，东亚有潜力再次树立榜样。

此篇为中文翻译文章，原文“The End of ‘Growth with Equity’?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Equality in East Asia”刊登于 *Asia Pacific Issues* 2011年7月第101期